

前言

本書既是我個人的求知之旅，也是一次學術探索的嘗試。1960年代，時值文化大革命，無數中學生「自願」來到農村上山下鄉，而我恰好「有機會」來到了內蒙古。有些年長的人好意提醒我：「不要去！那是個黃沙埋白骨的地方！」又有些人說：「內蒙古好呀！牛羊肥壯駝鈴響。」當然，那時我並沒有選擇餘地。來到內蒙古後，我發現這兩種描述都不準確。但兩者間的鮮明對比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後，我才意識到，那些勸告過我的人其實與大多數生活在中國內地的人一樣，沒有任何邊疆地區的親身經歷。對內蒙古的印象不過是來自古詩詞中對民族疆域的兩種典型描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典型描述都不約而同地只涉及景物而忽略了人，這種視點選擇幾千年來對邊疆地區的民族屬性視而不見。就我個人而言，如果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來內蒙古插隊，我大概也不會對邊疆民族事務產生任何興趣。更何況，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對民族問題上心絕不是一件時髦的事情！所以，我不得不在本書一開始就承認，我的寫作並沒有做到完全的客觀。

本書的主要論點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直到其主力從中國南部轉移到西北邊境地區後，才開始有了切實可行的民族政策。對這一論點的感悟，在某種程度上出自我的個人經歷。在插隊的那些年

裏，在暫時離開漢人居住的地區後，我們這批「知識青年」不得不學習如何在蒙古游牧社會中生存。乍一看來，我這種出自自身經歷的研究方法似乎有違歷史研究中客觀性的準則，而鑒於歷史無法重演，歷史學家自身與某一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相類似的經歷，或許反而能啟發一些真知灼見，亦未可知。

作為一部學術研究，本書旨在從更廣泛的角度探索民族屬性在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歷史地位。我從幾年前便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通過以前在外交史領域的研究，我相信以「外交」、「內政」劃界的常規性研究並不能揭示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複雜性。中國的民族邊疆問題似乎是處於兩種常規研究之間的「灰色地帶」，好比是中國歷史帷幕上的接縫。

本書研究的中心着眼於1949年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1949年是本書稱之為「中國歷史性更新」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共產黨政權、領土和政治的重新統一、民族關係的重新整合以及外交關係的轉向在中國同時發生，從而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本書研究止於1945年，闡明中國共產黨在民族事務方面，為以後幾年奪取政權的最後衝刺，完成了甚麼樣的準備。至於中國在內戰時期的民族政治，尤其是內蒙、新疆、西藏的自治或獨立問題，有待以後的專論。

通過這一探索，我不僅希望能與研究中國民族課題或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的學者們進行對話，更企望將民族、邊疆問題與自清朝以來、中國近代史的以漢族為中心的所謂主流歷史掛鉤。雖說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治即是中國共產黨針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但其真正意義遠不止此，它還涉及到對「中華民族」的組成、中國的領土屬性、中國與鄰國及國際社會的相互關係等一系列根本性問題的「解決」。而在漢族人口佔總人口92%的中國，民族與民族邊疆問題常被邊緣化，這已經對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造成影響。

誠然，社會學、政治學領域的學者一直對中國少數民族有着濃厚的興趣，尤其是近二十年，中外學者的幾部重要專著在這一領域

掀起了一股熱潮。然而，這些針對某些特定少數民族的、高度專業化的學術研究仍鮮為人知。就歷史學家而言，除少數特例以外，對20世紀中國史的研究多局限於中國東部地區。至於對1949年前後中共民族政治的解讀，普遍看法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治不過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理論的變異，以及對前蘇聯解決民族問題模式的沿襲。

因此，我們心中對中國現行的多民族制度與過去多族群社會之間的歷史關聯認識不清，往往注重中國本土與邊疆區域關係中的事件，而較少考慮其內在的邏輯。本書中，我將在中國歷史的範疇下，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國家的現代化和民族化的進程，重新界定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治立場，進而對上述問題進行一一考察。本書雖無意忽視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普遍性影響，但着重強調中國共產主義民族政治的演變，由於某些特定的長、短期因素而因循了一條非同尋常的獨特道路。長期因素包括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及民族地理佈局，短期因素則指中國共產黨不斷變化的政治際遇與相關的地緣戰略行動。

我的本行是外交史，在寫書的過程中卻跨越了數門學科，同時也領悟到民族間的往來其實與國家間的交鋒同樣的複雜、微妙和變化無常。書中引用的所有學術著作都給我的研究帶來了莫大的幫助。相比1990年代以前研究中國共產主義民族問題的學者，更讓我感到幸運的是，自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檔案館的18卷《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終於付梓出版。兩年後，中國共產黨統戰部出版了限於「內部發行」的《民族問題文獻彙編》。此外，2000年以來又出版了一些有關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共紅軍的軍事與政治以及中共邊區地方機構的文件集。這些材料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視野。雖然中共黨史的檔案研究在中國依然困難重重，但這些文件為探索中共領導層「內部思考」及決策過程的實證研究，提供了相當大的可能性。

在寫這本書並為之尋找歸宿的漫長過程中，我有幸得到了許多學者的幫助。書中所呈現的想法起始於1997至1999年，當時我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作駐校研究。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與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極盡東道之誼，為我的研究計劃給予了極大的幫助與便利。在我駐校研究的最後階段，戈德曼(Merle Goldman)教授主持了一場東亞學術討論會，我也得以借此機會檢驗了最初的一些設想。本書中的部分觀點曾發表於魏楚雄(George Wei)教授與我合作編寫的*Chinese Nationalism in Perspective: Historical and Recent Cases* (Greenwood Press, 2001)一書中，感謝Greenwood Press允許我在本書中進一步闡述當時提出的一些有關觀點。隨着研究工作的進展，艾鶯德(Christopher Atwood)、寶力格(Uradyn Bulag)、戈倫夫(Tom Gunfeld)、海沙威(Robert Hathaway)、梁思文(Steven Levine)等教授不吝賜教，抽空閱讀了本書原稿的部分或全部內容，他們的深刻見解以及建設性的批評使我受益匪淺。另外，感謝陳兼教授向我推薦《民族問題文獻彙編》一書，同樣感謝內蒙古社會科學學院圖書信息中心的烏力吉圖教授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農偉雄教授，為我尋找重要資料提供了許多幫助。此外，我還要感謝余敏玲、王健民、汪朝光、魏楚雄、普拉坎斯(Andrejs Plakans)、泰勒(Joseph Taylor)、蒲柏(Christine Pope)與佩登(John Paden)等教授深思熟慮的評論與建議。書中所有的謬誤，責任自當在我。

在獲得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麥克阿瑟研究職位(SSRC-MacArthur Fellowship)以及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研究基金後，我得以開始了本書的研究及撰寫工作。成書的最後階段，我還得到了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暨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政策研究基金(Woodrow Wilson Center-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sian Policy Fellowship)的資助，同時感謝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歷史系准許我在此階段離校研

究，並給予我莫大的支持。伍德羅·威爾遜中心亞洲項目的主任海沙威與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出版社的社長布林利 (Joseph Brinley) 在得知我的研究後，馬上批准了書籍的出版事宜。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出版社的編輯卡恩 (Yamile Kahn) 與史丹福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貝爾 (Muriel Bell) 對本書的出版計劃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並以各種方式促進提高了最後成書的品質。同時我也希望對尼爾森 (Bill Nelson) 為繪製書中地圖所付出的努力表示真誠的感謝。此外，在本書成形之際，必須感謝蓋爾芬德 (Lawrence Gelfand) 教授、孔華潤 (Warren Cohen) 教授及入江昭 (Akira Iriye) 教授長期以來對我的鼓勵與教誨。

最後，感謝紅星、鷹嬰、坦妮、曉西、曉紅和二老自始至終的陪伴，是他們支持鼓勵我堅持不輟。謹以本書獻給他們。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學術